

夜先杯

一个时代总会产生代表那个时代氛围和主导思潮的歌声。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徐悲鸿建议，由第一届全国政协（1949年人大尚未成立）通过而成为《国歌》的。这歌曾经激起了全民同仇敌忾的抗日高潮，至今已经传唱了七十多年。面对国际上经济、科技、国防力量激烈竞争的态势，中国人在21世纪照样敢于唱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自信自强的全民呐喊，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时代。我记得抗美援朝时，志愿参军的同学

时代与歌声

舒展文方成图

溢于言表，它已在中国人心中生根，流传了上百年。这才叫不朽的流行歌曲！

我的孙女课余练电子琴，每天都是课本上规定的练习曲目和世界的名家名曲。忽然有一天，她边弹边唱：“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不觉耳目一新！“你唱的不是孟浩然的《春晓》么？谁作的曲呀？”她也答不上来。这首诗总共才20个字，既有悠美的韵致，又含跌宕醇永。诗是耳熟能详，一旦有了曲子，它就可以背诵而变得不胫而走了。后来得知，这是谷建芬的作品，她已谱写了二十多首古诗词。

但是并不代表某一个时代，却是宣泄抒发个人情怀思绪的普世人性，传唱了几百年的歌曲，也不可胜数。比

—— —— ——



一个细雨绵绵的早晨，我去了高桥烈士墓。

这是我多年的心结了。缘于我的父辈。

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无数次地告诉我，说当年解放上海战役中，高桥一仗打得很惨。叙述当年的每一次，父亲都用了一个“惨”字。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叫“惨”，但我知道“惨”一定很可怕，因为父亲每次都是很痛苦很艰难地将它挤出牙缝。稍大的时候，父亲带我去高桥烈士墓经受“惨”：一个个墓穴苍凉而悲壮地写满了惨烈。献花、默哀、磕头，父亲告诉我那下面躺着的是他的战友。那时我还不识字，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记住了高桥

战役打了五天五夜；记住了有一座铁桥，桥的这边是解放军，桥的那边是国民党军队，两军对峙，炮火激烈；记住了父亲很多的战友浸在被鲜血染红的河水里，几天几夜，下身都溃烂了……就那次，“惨”生疼地刻在了我的心头；就那次，我对父亲说，我会来看他们的！

几十年后的某天晚上，《战上海》的冲锋号“哒哒”地激醒了我的记忆，我惊乍而起，忽然就想起当年说的这句话，忽然就有了冲动，忽然就按捺不住了自己，我说，我得去看他们了！

那天，当我披着一身雨雾出现在高桥烈士墓的时候，连看门人都觉得惊奇：这春寒料

这是一片陈旧泛黄、水渍晕漫的纸张，在锈迹斑斑的骑马钉两侧，布满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钢笔字，很容易被人忽视。这就是70年前，贺绿汀《游击队歌》原曲稿。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诞生在日寇侵华的腥风

血雨中，吟唱在青纱帐、地道里，响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它鼓舞人民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70年前的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贺绿汀等一批爱国青年自发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南站出发，沿沪宁、陇海、同蒲铁路线作巡回慰问演出。年底，他们渡过黄河来到山西临汾，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了。贺绿汀先生在彭雪枫主任的生动介绍中，被八路军巧妙运用游击战，沉重打击日军的奇迹深深打动。他的脑海里呈现了游击队员神出鬼没、机智勇敢的动人场景。他热血沸腾，节奏、旋律喷涌而出。神枪手的气息，飞行军的步伐，宿营地的静谧，与仇敌拼杀的怒吼，成了他信手拈来的音乐元素。

如果说《牧童短笛》《森吉德玛》《晚会》等是贺绿汀陶醉于民族音乐的神来之笔，《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是他在十里洋场对黑暗势力的呐喊，那么，《游击队歌》则是他在党的熏陶下创作的最为成功、永垂不朽的红色歌曲。它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它浪漫乐观、举重若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夺取胜利的斗志和信心，得到了朱德、任弼时、刘伯承等首长的一致好评。杨得志即将率部队开赴前线，竟急邀贺绿汀一个营、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白求恩大夫更是喜欢哼唱这首歌。

今年是“八·一三”、“南京大屠杀”

70周年纪念，也是《游击队歌》70周年诞辰。当我来到46年前亲自从贺绿汀先生手中接受《游击队歌》原稿的陈绍康先生家中拜访时，这位刚刚还自称“老糊涂”的一大纪念馆研究员，立刻神采奕奕：“那是在1961年8月，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贺老写的《游击队歌创作经过》，让我萌动了征集原曲稿的想法。几天后，当我应约来到贺家亲眼见到了这份珍贵的原稿时，竟情不自禁轻轻哼唱起来，贺老听了哈哈大笑，并真诚地表示‘《游击队歌》曲稿捐献给你们，由国家收藏好’。”我们没有辜负贺老的期望，《游击队歌》原曲稿已被国家文物局正式确认为一级文物。

王安石，很自然会想起他的那些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然而王安石却曾被人批评是个剽窃者。他的很多诗作，都有前人的影子，甚至是很明显的仿作，譬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那个“绿”字，历来被看作诗歌讲究修辞、反复推敲的成功范例。据说王安石在诗稿上改了十多次，起初是“春风又到江南岸”，那个“到”字，被改成“过”，又改成“入”，改成“满”，都无法使他满意，最后，找到了那个“绿”字，才成为宋诗中的名句。王安石不止一次在诗中用这个绿字，在《送和甫寄女子》一诗中，又有：“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然而用绿字作动词描绘春风，并不是王安石的首创。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钱钟书先生于是发出诘问：“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梅花》中“遥知不是雪，为

有暗香来”两句，也是从别人那里借鉴而来，汉代苏子卿有“只应是雪，不悟有香来”之句，王安石的《梅花》，明显是从苏子卿诗句中化出。

《书湖阴先生壁》一诗中“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句，也有效仿他人之嫌，五代沈彬有“地限一水巡城转，天约群山附郭来”之句，对照一下，其中的因袭关系很明显。

王安石改他人诗句，最失败的一例，是将唐人王籍《入若耶溪》中“鸟鸣山更幽”改为“一鸟不鸣林更幽”。王籍此诗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两句，以动衬静，以声显幽，有奇妙的艺术效果，被王安石这样一改，则意味全无。在当时，王安石的这一改就遭人诟病，黄庭坚嘲讽他这是“点金成铁”。

王安石诗歌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来自钱钟书先生。钱先生曾在他的《谈艺录》中这样议论王安石：“每逢他人佳句，必巧夺豪取，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已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

在钱钟书的笔下，王安石成了一个诗坛窃贼。钱先生虽然批之有据，但我以为他还是太尖刻了一点。王安石能跻身唐宋八大家，靠剽窃作贼绝不可能，他的文学成就，早已有公论。古人写诗引经据典、化前人诗句为己用，也是家常便饭，并非王安石一人如此。欧阳修当年曾写诗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十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是同时代人的由衷赞叹，不是拍马屁。能使欧阳修这样的大才子如此折服，可以想见王安石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游击队歌原稿在“一大”

马建萍

邀贺绿汀一个营、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白求恩大夫更是喜欢哼唱这首歌。

今年是“八·一三”、“南京大屠杀”

70周年纪念，也是《游击队歌》70周年诞辰。当我来到46年前亲自从贺绿汀先生手中接受《游击队歌》原稿的陈绍康先生

家中拜访时，这位刚刚还自称“老糊涂”的一大纪念馆研究员，立刻神采奕奕：“那是在1961年8月，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贺老写的《游击队歌创作经过》，让我萌动了征集原曲稿的想法。几天后，当我应约来到贺家亲眼见到了这份珍贵的原稿时，竟情不自禁轻轻哼唱起来，贺老听了哈哈大笑，并真诚地表示‘《游击队歌》曲稿捐献给你们，由国家收藏好’。”我们没有辜负贺老的期望，《游击队歌》原曲稿已被国家文物局正式确认为一级文物。

走鹊桥

(外一首)
刘章

人间天上不分明，
老汉携妻走碧空。
风雨同舟经四纪，
鹊飞桥动自无惊。

天河山听涛

万世谁闻银汉声？
天河山上我来听。
悲歌化做销魂乐，
流水淙淙奏古筝。

现在的教材终于有了。由陈一萍、胡文新和赵宗心三位老大姐精心编辑的《此曲只应神州有》(又名《中国古诗词歌曲选》，由武汉天马出版公司面世了。它是由古代歌曲(从诗经小雅《鹿鸣》到郑板桥的《道情》)；今人为古诗词谱曲(如刘雪庵为李白写的《谁家玉笛……》和曹雪芹的《红豆词》)，还有中国古诗词配外国歌曲(如李叔同的《送别》)；计三部分，共182首。

我为中国的现代教育重视美育和正在由应试向素质教育转型，没有变成豚犬而感到庆幸，同时又不得不向三位老大姐不是出于要与当今流行歌曲争个高下输赢的动机，在晚年用退休金挖掘出了这么一大笔丰厚财宝，对这种热心公益事业锲而不舍的精神，我深表敬意！

蔡元培主持民国教育部时，聘请32岁的鲁迅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要是管博物、图书、美术、文学、音乐、戏剧等学科，总称美育。但临时教育会议(蔡元培因反袁世凯辞职后设)，要删掉美育。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此种豚犬，可

以听到：你来了？声音从好远好远的地方传来，却清晰，却厚实，却亲切！

于是我蹲下身，拂去墓碑上的雨幕。墓碑上，刻着先烈的名字。我逐一念着他们的名字，告诉他们，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女孩跟着父亲来到这儿。那时候，她还不懂事，只知道父亲要带她去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英雄。所以，小女孩的兜里装满了糖，她天真地以为那花花绿绿的糖纸英雄一定喜欢。可是到了这儿，她才知道英雄在黑土下，英雄永远也不可能出来。

但她还是把糖放在了英雄的墓前。那时的墓碑不是现在的样子，没有这么大，也没有这么平

整。但小女孩很认真，一粒两粒三粒地摆着。她想，等到下雨的时候，糖会化的，雨水会把甜味渗给英雄……

那天，在纷纷雨中，我就这么无声地说着这个故事。

说这话的时候我有些恍惚，而后，我回到了现实。

我摸摸黑土，拔去几根刚刚出土的小草，说，该告别了。

走出烈士墓，回首望，龙柏无言，鸟儿无声，而我心，却有了一份慰藉：

我于无声处，了了我儿时的承诺。

明日请

冬至的怀念

看《生命是隐藏在生活里的吗？》



蝶恋花 (中国画) 夏荷生

李福眠

砚迷心窍。1965年10月，我在文化街福州路上上海旧书店，淘得陈翔鹤校，戴洪森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老残游记》一册。阅读时，我把各文中“一方小砚台，几枝笔，一个印色盒子”，“遂从枕头匣内取出笔砚来”、“借了店里的砚台”、“将笔在砚台上蘸好了墨，呵了一口气”诸有“砚”字之名，旁画红线，如临其境，叨陪末座。是书，至今存橱。当年由砚而迁想妙得之境，依然荡漾心田。

玉屑集

说起王安石，很自然会想起他的那些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遥知

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然而王安石却曾被人批评是个剽窃者。他的很多诗作，都有前人的影子，甚至是很明显的仿作，譬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那个“绿”字，历来被看作诗歌讲究修辞、反复推敲的成功范例。据说王安石在诗稿上改了十多次，起初是“春风又到江南岸”，那个“到”字，被改成“过”，又改成“入”，改成“满”，都无法使他满意，最后，找到了那个“绿”字，才成为宋诗中的名句。王安石不止一次在诗中用这个绿字，在《送和甫寄女子》一诗中，又有：“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汝过江时”。然而用绿字作动词描绘春风，并不是王安石的首创。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赋柳色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雨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山门绿，小隐湖中花。’”钱钟书先生于是发出诘问：“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梅花》中“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两句，也是从别人那里借鉴而来，汉代苏子卿有“只应是雪，不悟有香来”之句，王安石的《梅花》，明显是从苏子卿诗句中化出。

《书湖阴先生壁》一诗中“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句，也有效仿他人之嫌，五代沈彬有“地限一水巡城转，天约群山附郭来”之句，对照一下，其中的因袭关系很明显。

王安石改他人诗句，最失败的一例，是将唐人王籍《入若耶溪》中“鸟鸣山更幽”改为“一鸟不鸣林更幽”。王籍此诗中“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两句，以动衬静，以声显幽，有奇妙的艺术效果，被王安石这样一改，则意味全无。在当时，王安石的这一改就遭人诟病，黄庭坚嘲讽他这是“点金成铁”。

王安石诗歌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来自钱钟书先生。钱先生曾在他的《谈艺录》中这样议论王安石：“每逢他人佳句，必巧夺豪取，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已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

在钱钟书的笔下，王安石成了一个诗坛窃贼。钱先生虽然批之有据，但我以为他还是太尖刻了一点。王安石能跻身唐宋八大家，靠剽窃作贼绝不可能，他的文学成就，早已有公论。古人写诗引经据典、化前人诗句为己用，也是家常便饭，并非王安石一人如此。欧阳修当年曾写诗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十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是同时代人的由衷赞叹，不是拍马屁。能使欧阳修这样的大才子如此折服，可以想见王安石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砚痴

李福眠

砚迷心窍。1965年10月，我在文化街福州路上上海旧书店，淘得陈翔鹤校，戴洪森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老残游记》一册。阅读时，我把各文中“一方小砚台，几枝笔，一个印色盒子”，“遂从枕头匣内取出笔砚来”、“借了店里的砚台”、“将笔在砚台上蘸好了墨，呵了一口气”诸有“砚”字之名，旁画红线，如临其境，叨陪末座。是书，至今存橱。当年由砚而迁想妙得之境，依然荡漾心田。